

中国西北地区 现代化中的经济与 文化关系

倪国良 著

95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 SU REN MIN CHU BAN SHE

兰州大学笛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西北地区

现代化中的经济与文化关系

倪国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的经济与文化关系

倪国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730030)**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20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6—01926—4/F · 181 定价:16.00 元

前　　言

一部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地区经济哲学和社会改革的思想史。经济实践，特别是经济理论与战略实施历来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因为社会经济因素同精神思想和心理因素是互为因果的。放眼全球，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的名字出现在一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不奇怪的。现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哲学气质和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大学者，而且精通数学，他的全集共 25 卷之巨，其中，第八卷即《概率论》成了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理论的先驱。在该书中，他把“理由不充足原理”更名为“中立原理”。的确，无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产生，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都是人类文化空间力系中合力的结果。在当代，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内涵和它已经或将会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的把握，是空间力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分力。

马克思揭示了历来为繁荣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政治、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就是从这个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相反，一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把国民经济生活过程中的内在的铁的逻辑之链和经济法则真正作为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第一性的最高权威确立起来，那么，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就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能够给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物质成果，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精神塑造及成果又会极大地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发展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辉煌。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文化，正是这个国

家或地区人类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古老而神秘的中国西北地区，占去了中国版图的近三分之一，华夏民族的先民很早就在这里生息。今天有30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活。这里虽没有很多迷人的现代都市，却吸取着现代文化的营养；虽地处内地，呈封闭状态，却依照着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生命和智慧，融进中国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西北民族文化。中国西北民族文化是外来文化和宗教文化开放在中国传统文化“根”上的一朵奇葩。

在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广袤大地上，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与灿烂。著名的古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联结在一起，来自于东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交汇在这里，然后又分流在亚欧各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得这一地区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和发展，曾独领中华历史风骚数百年。然而，近现代以来，西北地区饱尝了经济贫困落后的苦难，为了发展经济，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一代代西北儿女耕耘不止，奋发图强，乃至不惜对自己固有的经济和文化进行深入的批判和重估。在这一切的背后，鼓舞着西北人民如此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当急切奋斗的心情冷静下来，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正是西北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那种民族自强的精神，那种面对现实的理性态度，那种注重民生日用而不寄托于虚渺天国的人世的价值取向。

西北地区曾经多次面临衰落灭种的危险，但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一次次从困难和挫折中挣脱出来，乃至今日有了重振雄风、再次腾飞的契机。当西北地区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在中国兴起了所谓“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或隐或显地出现了一些向东方文化靠拢的因素；当世界经济普遍出现发展缓慢和衰退的不景气的时候，东亚的几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却仍

在保持着快速发展、后来居上的势头。这些为我们评估民族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探讨民族文化是否能医治和避免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的某些弊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的背景。

现代经济与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和互动关系，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绝不能低估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如果从时间、空间的大跨度来看，无论古今中外，文化在人类经济和历史发展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经济、政治、社会的种种问题，无不与深层次的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现代社会，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商品的文化投入即软投入越来越大，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经济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表现和凝结在商品中的文化力的竞争上。文化贫瘠的经济不可能有持久发展的基础。随着西北地区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必然要有现代文化与之相适应，不然则会严重制约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形成经济活动中新的文化障碍。

《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著《预谋21世纪》中说到：“不同社会对新挑战之所以会有不同反应，文化和精神因素的影响至为巨大。左右一国应变能力的最大因素，即在于社会态度、宗教信仰和文化。”重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古老文明的国家如此，像美国那样年轻的国家，也用它们的“美国精神”创造自己，并企图影响世界。经济力的竞争，恐怕离不开文化力的竞争。正像经济社会的多样性一样，文化的多元性是个复杂的、悠久的、深层的问题。

当全社会致力于探讨国家和地区经济问题、关心市场经济的建设的时候，也同样有必要把文化问题，特别是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放在重要日程。这不仅是短时应急的课题，而且是长期的战略任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振兴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吸

收世界一切进步的文化成果，形成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三个阶段的战略目标服务。

对待西北地区民族文化及其他生命源泉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作出科学总结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对西北民族文化及其“根”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科学的继承和发展，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势必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海内外一批现代新儒学正在兴起。一些誉满华夏的著名学者公开打起了国学的旗帜，提出了“市场经济与文化传统”这个重要命题。他们认为，“仁为精神文明，富为物质文明”，“仁与富可以相辅相成”。

在西方有许多有识之士，积极评价中国文化。布热津斯基说：“中国先进的文化，包括杰出的儒家哲学，它的报效国家的士大夫阶级的独立传统，以及它先进的商业技巧，的确代表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会不发挥强有力建设性影响。”他还说：“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融汇贯通，使准备着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领袖们非常自然地倾向依靠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传统。”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垂直的实用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级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家的文化遗产。这完全不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访问中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带着惊奇的心情离开中国”，“要想理解今日中国，就必须看它的过去。中国人感觉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悠久文明的一部分”。“中国，这一个国土辽阔，具有多种风情、喧闹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国家，21 世纪的一大部分就是在这里编织的。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已开始感觉到，未来这个世纪完全有可能以黄色作为其完结的色彩。”

“去东方时，我当时感觉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飞行，可回来时，我的感觉是伴着夕阳走，令人沮丧。”

在西方，有以上这些代表性人物对中国文化作出种种积极评价，在东方，更有一批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倡导儒家文化，并努力实践。李光耀总理说：“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的文化。”他说：“五十到七十年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他在谈到美国国会以借口“人权”而威胁中国时说：“美国每年都这样折腾一次。中国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的习惯和价值观已延续了4000年，它能因为美国国会的一纸决议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吗？”他还认为，“不论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好政府’。”“什么是好政府呢？”这恐怕要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亚洲人的价值观未必同美国人及欧洲人的价值观一样。“欧美人把个人的自由看成是价值，但我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坦率地说，我支持有效率的政府，为人民有效工作的政府。”^①

在研究民族文化和现代化这个大课题时，当然会有许多问题亟待探索。例如，关于伦理观念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是普遍规律，中国在明清时代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两大要目，中国文化传统中自古有之。伪古文《尚书》就说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中国从魏晋时期经西北地区传入内地的佛教，从《百丈清规》起确立了“节俭”和“勤劳”两大经济伦理的支柱。明清儒家主张“治生”论，提出了“新四民论”。这种新儒学伦理，成为商人的精神，与新教伦理一样，具有“运用最理性方法来达到非理性的目的”的根本特征。但是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其原因，

^① 参见胡平《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新高峰》，《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据李约瑟研究，科学是世界文明的公器，中国人在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中国人还缺少西方式的逻辑架构式的抽象思考，也没有西方式的经验科学的研究实践精神。这个论断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中国没有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原因是复杂的，可以从多角度探讨。问题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西方一些人总是认为，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必须依托西方的伦理观念，并且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人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特点，吸收西方进步的文明成果，包括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准则，为我所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主张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使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念，作为倡导，并通过社会各方面努力，重构一整套伦理体系，作为全社会各民族的精神支柱发挥其作用，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服务。

再如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西方人有西方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两种文化的差异，除了伦理观念外，还在许多方面、不同层面上反映出来。这种差异，有它的长期性，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越是根深蒂固；有它的兼容性，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有它的互补性，所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人际之间的“和而不同”、“和为贤”，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提供了重要依据。西北民族文化的几个组成方面的和谐共处、相互融合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当今社会，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而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商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都担负着文化交流使者的任务。他们在处理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方面起着特殊作用。国

外学者认为，“当今社会金钱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商人是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不能全盘赞成这种观点，但可以悟出一些道理。商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汉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都起过传播、交流的作用，正所谓“自古农工商贾号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士商异术而同志”。在这方面，古代西北地区在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实现东西方文明相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西北地区的商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间，他们以商品为载体，克服文化差异的困难，促进了商品交流，也实现了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倡导商业文化学，希望在商业和文化的结合上，推进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和国际的商业交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再如防止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腐败问题。马克思认为，在文化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恩格斯认为：商业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于是拜金主义就盛行起来。连同时代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麦克斯·韦伯也主张：反对损人利己的物欲主义，因为这是人类精神僵化的表现，是束缚西方精神的“铁笼”。其实在更早一些年代，倡导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者赫胥黎就说：用自我约束来替代自行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型产业文明只是物质型文明，富裕也到了极限，进入了“产业文明终结时期”。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暴力、吸毒、抢劫以及贫富悬殊和法律无序等问题，可见其衰败的程度。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了，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治理。其特征是权钱交易，需要从改革中解决。日本人腾村在《儒教文化是腐败的根源》一文中认为：“中国的腐败还有更深的根源。这就是儒教文化‘最主要特征家长制’的丑恶的一面。”他说：“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儒教文化’所具有的网络以及较高的教育水准

等因素起了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另一方面使国民团结起来的革命精神则倒退了，其弊端就明显起来。”“严重的问题是‘官’与‘商’的分界线已不清楚，它严重地阻碍了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他还说，“主要儒家文化国家中国和韩国，还有日本，贪污腐败都在蔓延。”这些论断中，有其正确的部分，如官商不分等。但他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值得商榷的。腐败，可说是世界现象。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大量存在。在东方，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加坡，廉政建设搞得好，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的家长制，确有其弊端，但把腐败的根源主要归之于家长制，也有失偏颇。防止腐败，需要从中国儒家文化的智慧宝库中吸收营养，并同西方的法治精神结合起来，革故鼎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秩序。欧洲新教伦理认为，它的一大成就是“打破亲族的束缚，使家和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系，没有事业功能，因此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其实，在东方社会不乏家族和商业结合发展事业的许多成功例子。当然这种家族集团，需要有科学的决策层和经营层为之奋斗。正如施密特所说的那种，“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益”。为此，我们提出了“新时代商人”的观点，试图从东方许多富有成就的海内外商人中，吸取经验，走出一条既创业又文明的道路。我们认为，当代企业家，人人是商人，人人是文人，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是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个巨大的宝库，亟待我们去开发，去发扬光大。梁漱溟先生曾经把“中国民族精神”，概括为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我们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发扬“浩然之气”，始终“自强不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经过五千年，经历了多次分合的过程。中

国文化的分分合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德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机遇不可失，世界商业中心正向东移”。“中国不光为‘国富民强’学习，应像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一样，再掀起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为21世纪全人类创造共有新文化”。匈牙利学者的看法是，“世界迟早必须在地球上存在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产生某种综合性的文明。至于这个综合性的文明是什么形式，将在何时产生，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生活在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各国人民今天要大些，从中国在当前世界上的分量和其众多的人口来看，中国文明今后将对现在似乎处于停滞的状态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面对时代的挑战，从事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工作者和实践者，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可供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就拿西北地区来说，历史文化宝库是巨大的，它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潜能，文化成就辉煌，有众多的历史轨迹。在现时，我们研究一个区域经济的特点时，常常冠以某某模式，加以概括。但这种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而忽视文化。可是这类地区在经济繁荣时，必须伴随着特有的文化、社会背景。在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更需发扬西北民族文化精神，使之服务于现代化。必须重视西北民族文化中注重儒家和商人的结合精神，重视他们的经济思想和创业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西北地区之所以曾经有过夺目的辉煌，除了大自然的造化外，也是经济与文化密切结合的结果。敦煌莫高窟、古代长安的盛世图等都从艺术的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繁荣的概况，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现象。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天时”，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机遇，发达地区成功的经验，“地利”这是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而“人和”，除了“政通”、“团结”，国家已经制定了向西倾斜的政策外，还有其自身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 21 世纪的希望：西北地区的现代化	(1)
一、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1)
二、改革开放是西北地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5)
三、21 世纪西北地区经济腾飞的机遇	(10)
第二章 治贫治愚：西北地区现代化任重道远	(24)
一、西北地区经济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24)
二、西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社会环境.....	(32)
三、治贫治愚：任重而道远.....	(35)
第三章 西北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现象	(46)
一、西北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46)
二、西北民族文化发展的形式与特点.....	(65)
三、西北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及其文化功能.....	(77)
第四章 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的文化变迁	(90)
一、现代化进程中西北民族文化变迁的经济动因.....	(90)
二、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失范现象.....	(97)
三、市场经济中西北民族文化范式的转变.....	(105)
第五章 西北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	(114)
一、西北民族文化与古代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114)
二、西北民族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与协调.....	(130)
三、西北民族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利弊.....	(148)

第六章 西北民族文化的现代构建:现代化中的文化体系	(167)
一、用世纪之交的目光来审视西北民族文化	(167)
二、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的文化建设	(189)
三、现代新型西北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	(194)
第七章 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现代化与文化	(201)
一、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现代化的迟滞曲折与发展道路	
.....	(201)
二、寻求实现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新增长源	(215)
三、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233)
第八章 西北地区工业现代化与文化	(252)
一、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252)
二、西北地区工业的人文生态	(264)
三、现代工业文化的建构与扩散:西北地区工业化的关键	(276)
第九章 西北地区人的现代化与文化	(290)
一、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观的变革和重构	(290)
二、现代化进程中西北人的生存模式重塑	(315)
三、在新的文化形态中增强个体活力	(340)
第十章 后来居上: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经济与文化发展	
战略的思考	(365)
一、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考	(365)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西北地区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	(375)
三、在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中推进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实现	(389)

第一章 中国21世纪的希望： 西北地区的现代化

一、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世界在走向21世纪，中国在走向21世纪。正如毛泽东的著名预言所说：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时代。今天，无论是我们看一看周围的世界，还是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跨世纪的雄壮步伐。

面对着这样一个既充满严峻挑战又有重大机遇的世界大舞台，跨世纪的中国已主动地作出反应。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经过2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新的经济体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准都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逐渐形成，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今天的中国也如同今天的世界一样，处在十字路口，新旧体制的尖锐矛盾、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新旧文化的正面冲突等等，都需要去解决，去探索。不克服改革开放事业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渐变的、积累的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过程。现代化不是一个指标的变化，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在内的变迁，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改革开放

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成就举世公认。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出现较大的反差，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中国西北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地区。在这一占我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居住着我国四分之一的居民，这里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没有出海口，使这一地区处于封闭状态，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西北地区与东南沿海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西北地区农民年均收入水平很低，至今未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一些地区在贫瘠土地上靠两只手搞饭吃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变。

造成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有过去经济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原因，有人口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失当的原因，其中封闭型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造成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上述原因造成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正在继续拉大。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仅有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化，而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因此应当实行区域协作、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战略。

党中央从制定“七五”计划开始，把中国经济地理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带，指出中国工业生产力总的趋势是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西移。“九五”计划中更是明确提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将实现西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亚欧大陆桥的建成，为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创造过丝绸之路通天下的奇迹，在今

天，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经过 40 多年的辛勤耕耘，已经打下了重新腾飞的基础。在 50 年代国家曾经把西北地区作为重点投资的新兴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累计投入近 3000 亿元，形成了固定资产 2000 多亿元的生产能力，配置了相当规模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形成以西安为中心，面向大西北的科技、教育研究中心。西北地区正在成为我国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化工、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毛棉纺织、军工、电子等重要产品的生产基地。矿产、土地、水力、人力、文化、旅游等资源的潜力还有待于得到充分开发，所有这些都是西北地区腾飞的潜在力量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目前，西北地区可以抓住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西移和借助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建立和开发沿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重振西北地区的经济，加快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建设步伐。

具体来说，西北地区的现代化有许多根本性的有利因素和潜在优势。

第一，西北地区各民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的根基。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克服各民族文化上的隔膜，从而成为有利于西北这个多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的因素，也是可供西北地区现代化运用的有利因素。

第二，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封建主义压迫、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拥有 12 亿人口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凭借它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正在影响并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这就为中国的现代化，为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个较历史任何时期更有凝聚力、更有威信的中央政府，获得了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